

■ 新作聚焦

赵德发长篇小说《大海风》：

从山乡改革史到山海变迁史

□尹林

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的文学发展史，某种意义上是从书写改革史到书写变迁史的过程。改革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制度、经济、人情变革有高度的敏感性。变迁则具有更强的客观与自在性，人的建设与创造参与社会变迁，在规划与设计之外也有很多出乎意料的惊喜或插曲。改革史复兴了文学的人学属性，变迁史则需加入更多的环境、自然、风物、交流、工艺、哲学、地域、物种等因素，承接了文学自古以来的博物学属性。读到《大海风》，会感到这是一部近代史诗，聚合了人力的主体性与自然的客观性，同时恢复了长篇小说物书写的强大传统，让书写更加饱满、丰腴，但又与结构、语言风格融为一体。

改革开放以来，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新市民小说等种种，都是改革精神在文本内外的交相辉映。有的流派书写变革，有的流派变革文学的叙述形式。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文学因子开始聚拢，促使文学聚变走向开阔。文学的深度与厚度不断增强，80年代的概念演绎与诗学建构在90年代逐渐走向开阔、恢宏与细腻，作家们都成了地域专家、工艺研究者，苦苦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马孔多”，以及属于自己的别致物象。在这个过程中，《红高粱》《白鹿原》《活着》等作品开始出现，不断打磨文学的启蒙色彩和大众情趣，使得文学能够做到雅俗共赏。

赵德发的小说在种种文化小说之中，最大的特质就是不急不缓，从容自信，情事合一。他的小说少有雕琢炫技之感，眼界十分开阔，没有被既定的行文路径所束缚，在赵德发的文学世界之中，我们既可以看见农民的精神史，又能捕捉到知识分子的微妙情感；既有土地的羁绊，又有着海风吹来的信号。在其创作历程中，既有《通腿儿》这样的细微到毛发的短篇小说，又有如《经山海》《继续与决绝》这样的长篇小说。无论是阅读他的作品还是与其交谈，都能感觉到他不只是谋求一部作品的成功，更多的是个人境界的拓宽与习得。阅读县志、史书、外国名著和田野调查、深入生活，对他来说是完成一部小说必不可少的。翻开《大海风》，读者会在这部小说细微与宏大的结合感到振奋，可以置身于他所书写的书院、沙滩、海船之上，而不是单靠想象的力量。对于民国制度、教育、商业、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千丝万缕的交织应用，让读者可以获得一种饱满的“快感”。

这里有宿家兄弟与邢家的恩怨，有邢昭衍与梭子、轿子姐妹新旧交织的爱情故事，有曲大牙等官痞流氓，也有憨厚老实的船长、帮工们。读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如古典小说《水浒传》般大开大合与快意恩仇的气魄，也可以读到如《红楼梦》般的婉转深致。邢泰稳固守土地观念，却在昭衍想要升级船只时毅然卖掉家后仅剩的一半田地。他告别人世，似乎象征着在齐鲁大地与海洋的交接带上，土地文明和海洋文明势必要有着艰难的争夺。当具体到行业发展细节以及胶东地区风物人情的时候，《大海风》又颇有巴尔扎克、左拉等法国作家铺叙叙事的能力，读者似乎在读具有博物性质的民国山东海陆文明的百科全书。赵德发对于此地民国风情的了解，具体深刻，细如发丝。

《大海风》一书经过充分调研，通过别致独特又熟悉的风物，连接了山东半岛的陆地文明和海洋文明，使得改



《大海风》是近年来中国海洋文学的集成之作，把海洋与陆地、开放与持重、发展与调整等关系处理得平衡自恰。该书经过充分调研，通过别致独特又熟悉的风物，连接了山东半岛的陆地文明和海洋文明，使得改革史开始与人文地理、历史、民俗等结合，成为了更为宏大广阔的变迁史

革史开始与人文地理、历史、民俗等结合，成为了更为宏大广阔的变迁史。山东文化一直存在着两种因子，一种是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即使到了现在，对传统美德的重视也一直是山东的名片。与此同时，从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就一直植根在山东半岛的精神史中。王润滋、矫健、刘玉民、张炜、莫言等一批山东作家都受到了双重文化的影响。刘玉民的《骚动之秋》较早获得茅盾文学奖，那时的山东文学已经在试图结合制度与文化，并落实到具体的生活美学之中。不过，对于海洋文学的书写，是近年来才开始发力的。从桑园到海运，是一个大的跃步。不久前，赵德发在与我的一次谈话中就讲到了山东文学应该有更多的海洋文化因子。山东作为中国海岸线最长的省份之一，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既海陆两跨，又四季分明；既能感受国内国际上较为前沿的气息，又深得中原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的遗韵。如果算上深得中原文化、三晋文化的影响。但海洋文化因子在山东作家乃至中国作家的文学空间中还应该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

赵德发的《大海风》是近年来中国海洋文学的集成之作。其最大的创新点，是把海洋与陆地、开放与持重、经济与道德、发展与调整、未来与记忆处理得非常充分。这些关系的平衡与自洽，体现在赵德发多年来注重文学细节书写的写作训练之中。翻开《大海风》，无论是对方言、民俗、器物感兴趣的专业读者，还是想在都市的钢铁森林中寻找灵魂皈依的普通读者，都能找到自己阅读的理由。船桅上的“走二子”“滑轮消蓬”、海浪中神秘莫测的礁石“大将军”“二将军”、具有地域特征和历史味道的地名“马蹄所”、象征着船民信仰和寄托的龙王庙、具有人性化命名的船号“菠菜汤”“小豆角”、止痛的中药“乌贼骨粉”、祭船的“上红日”“血网”“腰杠”的渔业工法，象征着恐惧与玄想的“月绛”“刁海”“短竿”的捕捞插曲、“大船钉”“蛤蜊眼”的人物诨名、“奶水治眼”的偏方，还有象征着大历史的“小平钱”、历史条约，以及种种掌故与行话，在《大海风》中几乎页页可见。但是这些词汇却并没有因为地域性而显得陌生，反而融合在精心编织的海洋故事中。这种

新颖而坚韧的“中国山海故事”讲述方法，被嵌合在教育史、海商史、革命史、农村社会史中。邢家是兼具典型性与标本性的家庭。邢家的苦难史、发家史、成长史是故事的主线，故事有催人奋进的筚路蓝缕，有令人振奋的勤劳致富，也有“天行有常”的灾祸与苦难。赵德发善于把握读者的欣赏习惯和阅读节奏，在奋进道路上“狠心”地为这个积善之家埋下九九八十一难，却又总能在绝境之中，为这个家庭乃至中国千千万万个普通的早期民族企业留下一抹亮色。

邢昭衍身上兼具了被启蒙者、主观能动的建设者与弄潮儿以及命运、时代浪潮之下作为肉体之躯的渺小人物等几个特征。通过他短暂的求学生涯，作者将其与庙堂联系起来，叙事之中不乏张睿这样的标志性人物以及国际航运交流这样的具体事件，使得小说具有宏大而具体的格局。同时，邢昭衍也属于乡土，他身上有着齐鲁文化中保守与朴实的一面，这形成了邢家在历史大潮中看似微不足道却能乘风破浪的道义精神。这些美好品质与道义品德，并非来自于强者世界的教化，而是与生俱来的淳朴与良善。赵德发歌颂了历史深处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作为人的纯粹与强悍。当我们读完最后一页，掩卷沉思之际，不能不回到这样一个普通的行船贩夫之家，在世界变迁加速的年代，带着独属于中国人的大陆精神，小心翼翼却又光明磊落地航行在国际变革、国家转型的时代大潮之中，琳琅的细节和强烈的落差会再度冲击人的内心。这是赵德发在苦心孤诣的潜行后交出的海洋文学的答卷，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赵德发的山海变迁史书写还没有结束，或许会从“现代”一直延续到“当代”。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书院院长助理）

■ 创作谈

李白诗云：“大块假我以文章。”我活到70岁，写作45年，对这句诗的感受越来越真切。我有生以来见过的“大块”分为两块：乡土与海洋；我的涉笔范围也分为两块：黄绿之域、蔚蓝之境。前些年主要写陆地上的芸芸众生，表现他们的生命状态；近年来则面向海洋，描绘那里的万千气象，展示人海关系。我从长江口走到鸭绿江口而后完成的长篇纪实文学《黄海传》，就是其中的一部作品。

我住在黄海之滨的日照市，闲暇时常到海边坐一会儿。我看到的海是具象的，波涛滚滚，潮来潮去，鱼儿在我脚边嬉戏一会儿又退隐不见，远处的货轮、渔船、帆板和控制它们的人各具风姿。大海与时代潮流同步，不断变换装饰，让景色日益壮美，给生活在海边和到此旅游的人们以视觉享受。

但我知道，在万顷碧波之下，悠悠岁月之中，有着丰厚的历史沉淀。就黄海海域而言，有传说中的仙山仙人，有中国与朝鲜、日本之间的渡船船桨，有一次次海战用过的刀剑与炮弹，有丧生水中的各色人物，更有两百年来中华民族用血泪写在这里的耻辱与光荣，有海洋文明在这里的日积月累。我想，身为作家，应该把这些打捞出来，成为写作素材。

我把网撒向了20世纪之初的“北洋”，也就是黄海、渤海。大清王朝风雨飘摇，终于崩溃。日本与西方列强在这里耀武扬威，挂外国旗号的炮舰、货轮来来往往，让蓝天碧海之间黑烟滚滚。海边的中国人依然借风使船，或搞捕捞，或搞贩运，帆篷像海面上的片片枯叶。而这时，越来越多的内地人活不下去，只好离乡背井闯关东。把他们从“海南”运到“海北”，再把他们在东北种出的高粱大豆运往华东一带，是那时中国北方航运业的重要业务。

那时的中国文化，也随国运的衰败迅速衰落，科举考试的废止是标志性事件。而在青岛，却有一座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的礼贤书院建了起来。创办者是一位德国传教士，他来中国后没有发展一个教徒，却被孔子的学说折服，改名为卫礼贤。他不但办书院，还把许多中国文化经典译介到西方，让“西风东渐”的文化大背景下，也有了“东风西渐”。礼贤书院培养了许多人才，其中既有文化界名流，也有工商界翘楚。

我的长篇小说《大海风》，就写了从礼贤书院走出一位。他叫邢昭衍，是海滨小镇马蹄所的渔家子弟。他的祖上这是这座城的第一任千总，抗倭英雄。邢昭衍就读于礼贤书院，却在乘坐自家商船回去过年时遭遇大海风，船毁人亡，只有他和一个小伙计活了下来。他只好辍学打工，数年后置办一条五桅大船做生意，去上海时知道了张謇的事迹，决心向这位晚清状元学习，实业救国。经过艰难置买上轮船，到青岛开办了轮船行，让他的“小火轮”载着乘客与货物在海上颠簸行进，努力挤进青岛、上海、大连等港口。邢昭衍的儿子邢为海在礼贤中学读书，责怪父亲只顾赚钱，不想为什么有那么多东家。邢昭衍说，我送那么多老乡到东北找活路，是度人行善。邢为海悲愤追问：你度他们，谁度中国？他毕业后投入了救国实践，不惧坐牢丢命。

当邢昭衍的轮船有了6艘，想要有千吨以上的大船时，中日战争爆发。祖上遗传给他的血性突然复活，他将所有轮船沉入胶州湾航道，想让敌舰无法进港。告别了青岛，告别了爱他的学妹蓓蓓，他雇一条小木船回到家乡马蹄所，突然听到女儿杏花在她的院子里一边织网一边唱：“早晨太阳晒渔网，迎面吹来了大海风……”美丽活泼的杏花，与守灯塔的俄罗斯青年伊戈尔相爱，却被一场大海风改变了命运，只好嫁给了一个打渔郎。邢昭衍已经好几年没见女儿，此刻站在城墙上看着她泪如雨下。

用上面的几百字介绍50多万字的作品，等于指着一簇浪花说海。我写的是一个时代，一场场大海风，一个个人的命运。在写作此书的三年时光里，我经常被情节感动，心潮难平。现在《大海风》已经出版，这是我在蔚蓝之境打捞过往的一大收获，心下甚慰。（作者系山东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在蔚蓝之境打捞过往

□赵德发

■ 新作快评

林为攀中篇小说《如何避免河流倒映天空》，《福建文学》2025年第1期

于厚重与轻盈之间捕捉日常瞬间

□廖雪霞

林为攀中篇小说《如何避免河流倒映天空》以一个十岁孩童的口吻讲述了关于客家村落庵寮的生活记忆。故事开始于“我”的父亲想要建新房。群居的围龙屋过于狭窄老旧，容纳不了家庭的居住需求，邻里又不愿拆了重建。于是爸爸和曾祖父协商，让其把三间老药房让出建新房，作为交换，父亲承诺给曾祖父养老送终。在房子落成前夕，父亲却不愿曾祖父将棺木一同带入新房，因此有意拖延封门。僵持许久后，父亲与母亲趁曾祖父出门之际将棺木付之一炬。结尾处曾祖父拐杖坠地的声音，宣告了曾祖父的坚守以失败告终。

在题材上，作品可以纳入新乡土叙事的范畴。小说以“我”、父亲、曾祖父三代客家人的生活轨迹为线索，围绕世纪之交客家人走出围龙屋盖房的核心事件，由小见大反映了客家人在乡土社会现代转型时期的真实境况。对于闽西地区文化与记忆的持续挖掘是林为攀一直以来的创作重点，此前的短篇小说集《搭客》就以客家原乡的记忆与文化为原型，叙写闽西客家文化地区在现代转型时期的微妙之处。新作在延续前作的追忆童年与故乡之外，聚焦于传统乡土的现代转型的这历史瞬间，以在场性的书写展现出乡土叙事的新质。

通过对庵寮寮生存空间更迭的描写，林为攀揭示了传统乡土中国转型时期的复杂形式。小说中有三个重要空间意象，一是聚居的围龙屋，二是曾祖父的棺木，三是父亲的新屋。围龙屋作为客家人的传统民居建筑，体

现了客家文化的传统礼制与族群意识；棺材是曾祖父的安身之所，也是其对入土为安的传统丧葬习俗的坚持，二者共同构成了封闭的乡土性的象征；而父亲的新房是对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和资源的追求，对应的是现代性的发展需求。面对日益兴旺的人群和变动不居的世界，古旧的围龙屋显得过于拥挤与破败，曾祖父的棺材也和新房格格不入，改变势在必行。对于空间的干预、改造乃至于生产是现代性显形的重要机制。小说中曾祖父与父亲在棺木留存问题上的冲突，实际上是“乡土中国”发展历程中乡土性与现代性的激烈碰撞。在小说的结尾，客家人选择走出围龙屋建房自住，曾祖父的棺材也被付之一炬，预示着“超稳定”的乡土空间在现代转型过程中被取代、改变与重构。

回顾乡土文学的创作传统，传统乡土的现代性变迁始终是一个宏大而深刻的命题。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结构中，一批批作家寄寓了或批判或怀念的情感判断和价值取向。在处理这一命题时，林为攀选择以儿童视角包裹乡土，赋予厚重的乡土叙事以轻盈的质地。小说借“我”这一未成年的孩童之口，将父亲建房、曾祖父守棺的主线一一托出。在主线之外，穿插着诸多“我”与玩伴林为强的生活趣事，包括两人跟踪曾祖父赴圩、在猪圈顶下棋、替林为强奶奶干农活帮倒忙等。种种小插曲构成了庵寮寮生活的另一面，显示出乡土生活的多样与鲜活。

同时，这种轻盈还在于以儿童视角小说重拾乡土的日常性。在乡土现代性变迁的历

史背景下，林为攀以童稚乡音演绎了乡土记忆的另一种曲调。在“我”的叙述中，曾祖父对于死亡的郑重其事被化解为一顿美味的簸箕粿，围龙屋的日渐萧条也被以没有洗漱梯打搅的慵懒、不再能承受“我”奔跑的楼梯一笔带过，父亲与曾祖父的较量远不如伙伴们的棋局来得战况激烈。至于乡土空间的现代性转变，在“我”眼中也具象化为密集的电线路缠绕了天空、切割了夕阳与朝霞的图景。对于少不更事的“我”而言，现代性不是疾风骤雨，也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如水漫过田般的缓慢浸染与渗透。林为攀以一种在场性、经验化的写作，将传统与现代、守旧与变通等沉重命题化为乡土生活的吉光片羽，重现乡土变迁的日常性。在这日常性中，有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与交锋，但更多时候二者的关系又是复杂杂糅的。父亲孜孜以求的新房建造于老药房之上，也说明乡土性与现代性的互渗与交融，恰恰是中国乡土社会变迁与发展的现实特色与独特经验。

《如何避免河流倒映天空》并无书写宏大叙事的伟愿，却对切身性的记忆情有独钟。在乡土的厚重与童年的轻盈之间，林为攀复现了中国乡土在现代转型时期的复杂、含混与细碎，重铸了真实、日常性的瞬间。在这些瞬间之中，饱含着作者对于故土上的温情回望，正如小说中那条倒映天空的河流始终隐现在故事之外，而真正蕴藉了无数乡土子女真挚乡愁与怀念的，是童年洗脸时偶然被装入盆中的一汪明月。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

■ 短评

“小院种春风，雨露情浓”

——读钟与月诗词集《却是多情笑我》

□简静

读诗词集《却是多情笑我》，有两个意象让人印象深刻：“钟”与“月”。在东方意象中，古刹“钟”声，悠远寂寥，含蓄、缥缈，至简蕴藏妙韵；“月”的意象纯粹、柔软、静谧、美好且寓含着伤感与乡愁。“钟”是人的造物，“月”是自然造物。钟声之远播与月光之普照，从听觉、视觉的角度，织就了诗学精神的经纬空间。

诗人在自序中坦言：“诗词的笔触必须紧贴时代的脉搏上，为时代而赋，为进步而歌。”《却是多情笑我》是钟与月的第二本诗词集，他先后写下800余首诗词。从题材上看，诗人偏重于个体生命体验，作品以小见大，手法上精准且克制，如“小院种春风，雨露情浓。几枝月季半年红。片片菜畦匀作去，手握葱茏”。《浪淘沙》他从自然界季节更替的宏观，到一枝月季雨露生情的微观，再到流连其间的生活妙趣，以小我、小院管窥大我、宇宙，以个体生命体验感知自然的变幻。又如“又见雪纷纷，直到黄昏。伤春消息不闻。乍暖还寒难作息，欲语无门。黄犬吠山村，少了温存。农家心事向君论。忧地忧天忧岁月，苦煞老身”。《浪淘沙》“黄昏”“伤春”“老身”分别从时间、季节、身体三个维度讲述慢慢老去的岁月，通过一场雪、一座村、一只狗，在无声与有声的相续交叠中，流露出对农村日渐凋零的隐隐担忧。

从诗词表达方式上，尽管诗人以“老语徒周厚”自谦，实则是透过苏东坡的艺术之理，解决诗与诗人的关系，在工作、游历、抒怀、状物、回忆中，用诗的方式观察、描述生活。“微凉轻透，好风偏细，近水近山天地。擎天三树涅槃生，千龄叶，几番交替。昭明书卷，南朝禅唱，天籁之音渐逝。身心长遂晚云轻，款步过，西

边古寺。”（《鹊桥仙》）这首游历诗借浦口惠济寺三株历经沧桑的古树，探讨人的存在之于身心的意义。诗永远是除不尽的余数，诗人不断寻找生活与艺术的平衡。

在移情和回归的过程，诗人找到了一些有趣的方法，本集中多有呈现。一是重句写作。诗人在癸卯中秋所写的一组七绝中以“又到万人争睹时”的相同首句起笔，写人叙事，笔底生花，满纸尽是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诗歌创作中常有同题写作，少有重句写作，这里，它的效果在于“万人争睹”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次次的多元再现，有点像电影的叠加镜头，仿佛有一群群人进入视野，不断刷新你的阅读印象。法国作家雷蒙·格诺诺的经典之作《风格练习》，尝试以99种不同的方式书写同一件事。尽管二者并不完全相同，但诗人的探索精神值得重视。二是遣词中多用习语、口语。周氏兄弟写旧体，常以见雪纷纷，直道黄昏。伤春消息不闻。乍暖还寒难作息，欲语无门。黄犬吠山村，少了温存。农家心事向君论。忧地忧天忧岁月，苦煞老身”。《浪淘沙》“黄昏”“伤春”“老身”分别从时间、季节、身体三个维度讲述慢慢老去的岁月，通过一场雪、一座村、一只狗，在无声与有声的相续交叠中，流露出对农村日渐凋零的隐隐担忧。

（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